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美〕何伟亚 著
邓常春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美]何伟亚(James L. Hevia) 著

邓常春 译

刘 明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 [美] 何伟亚著; 邓常春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0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ISBN 7-80149-749-X

I. 怀… II. ①何… ②邓… III. 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清代 IV. D82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0075 号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著者: [美]何伟亚 (James L. Hevia)

译者: 邓常春

译校者: 刘明

责任编辑: 光知

责任印制: 同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刷: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张: 11.5

字数: 274 千字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749-X/K·107

定价: 22.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2-0472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阅读中国系列书目

《中国问题研究的范式》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先哲的民主》

阅读中国系列编委

沟口雄三 贺照田 黄宗智
刘 东 李 强 孙 歌
汪 晖 杨念群 罗 琳

《中国问题研究的范式》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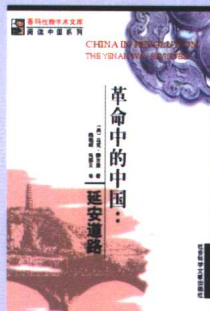
《先哲的民主》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by James L. Hevia

Copyright © 1995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经美国 Duke University Press 许可根据 1995 年英文版译出

阅读中国序

刘 东

已经是第二次在为这类译丛撰写总序了，这件事本身就使我忧心忡忡——我们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当代汉学，究竟最终对中国文化是福是祸？

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那么今番再来作序，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换句话说，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这当然可以算作一种成绩，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反倒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神煎熬。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作的主要主持者，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说，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本身，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象”，以致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会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也正因为这

样，那些学术研究家的文化使命，才恰在于检讨现有的知识缺陷，适时地进行修补、突破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挑明：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然而，僵化的另一面却又是泡沫化。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接触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幸而，我们还没有泯灭进行文明对话的渴望，还把这种对话看成惟一现实的救度之路。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国学与汉学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就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的“中国性”来。换句话说，对抗着堕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那个构成了两大学术群体之对话基础的“中国性”，作为双方共同意识的主动构成物，仍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超越的文明对话中

不断漂移，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由此一来，“中国”一词所包藏的无尽学术潜力，中国研究领域所蕴涵的无穷思想魅力，也就太值得发挥主动精神去阅读去领略了！这个肯定要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的学习过程，也同样需要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阅读心态，以便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像当年的佛学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一样，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的汉学成果，也有可能表现为空前文化创造力的机遇和前奏；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大家赶紧打开这些书本吧，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全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

刘 东

2001年12月18日于北大草庐

译 序*

罗志田

中国有句古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胡适曾据此提出一种历史观：许多足以开新局面的事物，“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①1793年访华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或许就是这样一类的事件。这一在当事人（至少是清朝当事人）看来并非特别重要的偶然事件，后来却引起西方史家的密切关注，产生出各式各样的诠释。各家比较一致的是都将此事件与半个世纪后的中英鸦片战争及再以后众多的中外冲突和不平等条约联系起来考察，从后来的结局反观作始之时，的确有“几同隔世”的感觉。

具体到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诠释，占主流也比较不那么牵强的看法是一个为贸易所驱动的英国之（帝国主义）扩张与一个傲慢且自视为世界中心的中华帝国相遇并（因文化误解而）发生冲突；由于（顽固的）清廷与英使在是否按常规朝贡方式行三跪九叩礼

* 本序据《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改写，观念和文字基本依旧，但对段落次序做了较大调整，并分成几个小节，希望能有利于读者。原文参考了 Robert A. Bickers, Kai-wing Chow, Pamela K. Crossley, Jerry Dennerline, John Lee, Nancy Park, Richard J. Smith 等人在英文学刊上的书评，特此说明并致谢。

①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7年1月25日（原书无页码），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这一问题上的争执，使团最后以失败告终。此事的失败体现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漠视和无知，最终导致了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后果。

与西方学界对此事的关注相比（除通俗读物外至少已有好几本专书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对此似乎更多取存而少论的态度，文章不多（且以泛论即“评价”为主），第一本（似乎也是惟一一本）研究性专著是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朱雍的著作是在大量中英文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结论是：马嘎尔尼使团虽以失败告终，却是“一次颇有收获的失败”。朱雍修正了过去认为清朝对外政策是“闭关自守”的观念，而提出“限关自守”的新见解（因为毕竟广州关一直是开放的），并指出这一政策的效用在早期尚不无可尝试之处。

但他指出，到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时，乾隆帝仍“以限关自守的政策，狂妄自大地拒绝一切外交要求，尤其是合理的要求，就显得相当幼稚，相当顽固，相当可笑”。由于乾隆帝“拒绝同英国特使进行认真的谈判，结果问题还是问题，最后竟然由鸦片战争来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乾隆的限关自守政策的可悲结局”（朱著第304、306页）。这里的言外之意，似乎乾隆帝的限关自守政策应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负主要责任。这正是许多西方学者的看法，也是前苏联学者的基本观念（前苏联的中国史和国际关系史著作以及我们受其影响的相关著作中，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内容大都出现在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一节之中，而不是其本应所在的18世纪末期）。

朱雍对此是提高到理论高度认识的，他认为乾隆帝的政策“在思想原则上背离民族利益和时代潮流。乾隆时期中英两国的冲突不是单纯的国务纠纷，而是两种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与封建主义时代）、两类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其中尽管带有民族冲突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因为当时英国的战略意

图主要不是军事侵略，而是用和平手段扩大经济利益”。乾隆帝在此时不能及时“对外开放”，而仍“抱残守缺”，结果“不仅违背了中华民族要求生存、发展和强大的根本愿望，而且脱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给中国社会种下了日后沦为半殖民地的祸因”（朱著第304~305页）。这样的规律性认识当然依靠的是史家特有的后见之明，朱雍在书中多次明确提出，他正是以“现代眼光”来审视这一历史事件的。

《怀柔远人》一书对上述各种关于马嘎尔尼使团的诠释提出了挑战，体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作者是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他获芝加哥大学博士，现任北卡罗纳大学（位于查佩尔山）历史系副教授，也是该校的国际研究计划主任。何伟亚教授在中国与欧洲列强关系以及19世纪的事件怎样影响当代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方式等领域发表过不少论文，目前完成中的一本书《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则是探讨大不列颠怎样试图将清帝国转化为其心甘情愿的伙伴以保护英国在亚洲的利益的。

《怀柔远人》于1995年出版，此后在欧美学界引起褒贬不一的反应（以赞扬者为多）。对何著评价的歧异主要在书中所运用的后现代主义方法上（详后），但在文字上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认知：有人说何著文笔优美，有人又说其文字晦涩难读。这大概仍与其研究取向有关：对熟悉后现代语汇和表述方式的人来说，何著的文笔或已近于优美；但对不甚熟悉之人，则其文字也真的接近晦涩难读的程度了^①。

① 英文中大量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概念虽然都是常见词汇，却均有其特定的指谓，很难依习见方式译成汉语，下面的拙译必有不准确之处，先请见谅。为免误导读者，凡概念性的词汇均附英文原词。

有一点是清楚的，何著在西方世界（北美和西欧）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一本关于清代中国的著作短期内便有十余篇不同学科的书评，实不多见。即使对何著持有不同看法的评论人，也基本承认何著颇有创新之处，是相关领域里一本必读的参考书。《怀柔远人》终在1997年获美国亚洲学会的李文森奖（最佳著作奖），表明学界对该书更多持肯定的态度^①。下面就对这本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全书的简单评介

《怀柔远人》全书分十章，第一章阐述作者那偏重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取向及其思想资源，并对既存（主要是美国的）关于清代对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批评。最后一章通过讨论马嘎尔尼使团在不同时期（主要是西方）的史学及非史学的表述中的演变进程，指出从马嘎尔尼时代开始的“现代主义”观念当时就影响了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认知和诠释（因而带有偏见），并且至今仍在影响整个中国研究甚而整个史学领域。针对这一点，作者最后提出了明显带有后现代主义痕迹的历史观，以矫正此类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

具体探讨史事的是第二至九章。第二章将18世纪的清王朝建构

① 应该说明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不久即在香港杂志上对评奖提出抗议并痛驳何著，这又引起加大系统（洛杉矶校区）的艾尔曼（Benjamin Elman）和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提出反批评，不久加大系统（河滨校区）的张隆溪和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及我本人先后参加了进一步的讨论。参见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艾尔曼、胡志德《马嘎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张隆溪《什么是“怀柔远人”？正名、考证与后现代式史学》；葛剑雄《就事论事与不就事论事——我看〈怀柔远人〉之争》；罗志田《夷夏之辨与“怀柔远人”的字义》，分别刊于《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1998年2月号、4月号、10月号。

为一个文化、政治和种族都呈多元化的广阔帝国，并探讨其对国内不同族群及对外国的政策。作者认为这一政策的基础是清代的“宾礼”，并在第五章中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第三章转向英国，从学术思想等层面构建 18 世纪英国的文化和政治语境，并从当时马嘎尔尼所属的英国“知识贵族”对世界、中国及国际关系的认知转入马嘎尔尼使团的筹备。第四章接着从英方记录考察直到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为止的使团过程，而第六至七章则从中方记录考察这一过程。第八章结合中英双方记录考察马嘎尔尼使团在觐见后的余波。以“宾礼与外交”为题的第九章其实是全书的结论，将双方对同一事件颇不相同的因应与记载上升到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观念体系，即英国的“主权平等”（sovereign equality）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hierarchical inclusion）天下观的碰撞。

何伟亚认为：今日存在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是 16 世纪以来欧洲全球扩张的产物，并已成为一种“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a naturalized hegemonic discourse）”。这里“自然化”指国家间应相互来往这一准则已成为大家接受的常识（其实一个国家或应有选择不与某些或所有其他国家交往的自由），而“霸权”则意味着没有此类交往传统的国家不得不按照他国制定的规则同意参与这样的国际交往（英文版第 27 页，下同）。同样，像过去那样在研究方法上“把西方客观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模式运用于非西方材料的研究”，恐怕也有些“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的意味。

他特别针对结构—功能体系理论、“对礼仪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观三项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西方流行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集三者之大成的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用“朝贡体制”来解释“中国之世界秩序”的系统观念，由于这一观念隐含的“西方先进/优越”而“中国落后/低劣”的先入之见，最后

的逻辑结论自然是“满清政府既要为它自己的崩溃负责，也要为西方的炮舰外交负责”（应该指出，这样简单概括费正清等人的观念是不全面的）。何伟亚提出两个新的认识途径：一是他所谓的“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multitude of lords）”，这才是清政府对其帝国的想像（imagining of empire），而不是什么“朝贡体制”；二是其著作的核心观念，即应更多注重清代的“宾礼”。

由于西人对异域的观察一向有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谓的“东方主义”存在^①，就解读马嘎尔尼使团而言，“清代史料对这一主题的叙述是无足轻重的，所有的史料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译解成观察者的话语规则，从而产生非常明显地声称优于历史上的中国当事人的知识，因为这些人处于表象与幻象的影响之下”（第19~20页）。这就是说，前此的学者常常把他们的“话语（discourse）”强加于清代材料，而何伟亚则拟“依据其自身的语汇来重建”清帝国的“领土间关系”（注意他使用interdomainal relations以区别于通常使用的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特殊性”，并据此提出一种与前不同的“理解[清]帝国礼仪”的新方式（第28页）。

在过去西方“对礼仪作用的功能—工具性解释”中，礼仪是“古代或前近代社会的典型特征”而“缺乏充分自觉的理性”，这就使礼仪在惯常的传统与现代之分中居于“传统”一边，实际带有“落后”的贬义（在这里“礼仪/传统”与“理性/现代”是两分而对立的）。据何伟亚的理解，“宾礼”中的等级差序产生于并包含在天人关系的准则之中（即人是整合并扩展天道的执行者），礼仪控制着居上位者与居下位者的互动关系，是按天意行动的人去形成及完善天下秩序这一程序的一个部分。仪式上的表现（行为）囊括了广及宏观的宇宙（或天道）和具体到微观的个人观念

^① 说详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